

五千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一卷

李喜所 主编
陈尚胜 著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世界知识出版社

陈尚胜 著

五千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一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 / 李喜所主编; 陈尚胜
著—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10

ISBN7-5012-1495-6

I. 五... II. 李... III. 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
史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4883 号

责任编辑 周宇君
责任出版 刘林琦
责任校对 余 岚

书 名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一卷
Wuqiannian Zhongwai Wenhua Jiaoliushi Diyijuan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book.com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1168 1/32 印张: 22 $\frac{1}{2}$ 字数: 575 千字
版次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一部世界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人类“原生文化”发祥地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也有人称做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就是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并影响了世界文化的进程。发源于尼罗河北部的埃及文化，由于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化相距不远，又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相互交流相对比较频繁。大量的考古成果已经证明，埃及和两河流域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技术乃至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算术、服饰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埃及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曾受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图画文字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地区）的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在公元前两千年中期逐步变成了西亚各族人民的通用文字。由于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大量交流和融合，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将其合称为东地中海文明或西亚文明。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虽然受伊朗高原的阻隔，和西亚文化交流非常困难，但目前的出土文物和一些文献记载充分说明，两个地区也时常有人员和货物的往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曾传入印度，西亚地区还出土了印度河流域生产的哈拉巴文化的印章。而作为欧洲文化发源地的希腊文化，很早就和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有着较为广泛的交流。在埃及曾发现了一个很古老的仓库，里面藏有希腊克里特岛生产的各种金银器皿；在克里特岛上出土的许多文物，

则明显地可以寻到埃及文化的因子，克里特的文字、壁画、印章、石器以及各种装饰品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加里特字母，很早就传到了希腊，希腊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是在乌加里特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直至今天的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梵文、阿拉伯文等，就字母来讲，都是乌加里特字母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的传播已经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至于公元前6世纪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北起希腊，南到埃及，东抵南亚次大陆印度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更互相冲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从原生期至后来的再生期，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疆域限制。

中国文化在原生期由于受地理因素和生产力的限制，无法冲破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与西亚文明和南亚文明交汇，但仍然遵循着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努力向外传播，与他民族文化交流，出现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中华文化圈，同时在汉代以后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有较多的交流和融合，显示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受容性。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中国和阿拉伯及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西传，改变了西亚、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风貌。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高僧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促成了在汉代以后逐步扩展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明清以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洲西方文化的呼啸东来，更迫使中国文化在困境中艰难而有力地向现代化迈进。一些学者将秦以前称

之为中国文化原生时的独立发展时期，将汉至宋概括为中印文化的融合时期，将五百多年前至今归之为中西文化的深刻交汇时期。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年则形象地把中国历史的演进说成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相互递进的时期。这些概说不能讲百分之百的科学，但道出了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毫无疑问，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曾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化也直接或间接推进了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进步。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着对文化交流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深化和近代学术体系在我国的逐渐建立，中国学者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即开始了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文化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尤其是在 1915 年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下，五四前后出现了研究文化的热潮。从推进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目的出发，一大批学者以西方文化为重要的参照系，致力于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问题，也就是老生常谈的古今中西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也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但问题远没有解决。这说明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的艰巨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五四之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批相当有水平的文化研究成果。就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来讲，已经写出了几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为这个新兴学术门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此后，历史在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和知识界又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除了继续讨论古今中西文化关系之外，对世界流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理论也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将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果。比较有水平的专著就有二十多部，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季羨林先生所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从总体上来考察，这些著作大都是从国别、地区或某方面的问题出发，分专题去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当然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如果进一步从推进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出发，还应该编写一部大型的，按照整个历史发展顺序，比较全面系统地来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的专著。为弥补这一欠缺，李喜所同志主编了这部五卷本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按时间顺序深入评述了从古代到1999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部著作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该书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依据中外文化交流的客观实际，上古至明中叶一卷，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一卷，而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有三卷，特别是首次将新中国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单列一卷加以详尽的叙述，略古详今，重点突出，将历史和现状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一种历史的整体感。如果详细阅读该书，还可以发现较为明显的三个特点：

1. 比较系统、全面，同时重点突出。该书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写作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交叉运用，以编年体为历史发展的基本顺序，把五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分阶段加以前后编排，历史脉络十分清晰；具体到每一个阶段，也可以讲每一卷，则在照顾到前后顺序的前提下采取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分专题进行较完整的评述，这就使具体的文化交流事件或人物相对独立和深入，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每一卷后所附的大事

年表，不仅便于查阅，而且补充了纪事本末体写作中年代会打乱的不足。可以讲在整体编排上，该书是独具匠心的。在内容的选择上，也颇有特色，做到了面和点的合理而有机地结合。全书在对五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系统描述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文化交流现象都做了重点考察，尤其是加强了交流的背景和结果的剖析。像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张骞通西域、佛教与中国文化、四大发明与世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西学东渐、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港澳与中西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与文化交流、当代西方思潮与中国等几十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问题，书中都进行了全面而有一定哲理的探讨。有了这些重点画面，自然会加深读者的印象并有所启迪，由历史联想到现在乃至未来。

2. 较多地进行了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是交流的前提，任何文化交流都是在相互比较下进行的，所以只有准确地了解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点，才能较好地去论述中外文化的交流。一部好的文化交流史必须突出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说，该书在这方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对于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书中都用了一定的篇幅加以论述；即使是同一文化圈内的文化，如日本文化、越南文化、朝鲜半岛文化等，书中也力所能及的做了评论。可喜的是，在一般剖析这些文化的不同特质的基础上，该书还运用文化生态的理论试图从不同文化生成的客观环境上去加以比较研究。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就必然有不同的特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这个道理。该书能够从文化的生成环境和生存状态来进行比较研究，就使文化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随着

文化比较研究的加深,自然就为文化的融合性和变异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可能性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样是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就会在中国生根开花,基督教就较难发展;而同样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出现了不少新的流派,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这都是文化的差异性使然。对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而且会给人以哲理性的思考。总之,以文化的比较为基础,去叙述文化交流的背景、过程、手段和影响,既避免了以往的一些论著平铺直叙罗列现象的缺陷,又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深度。

3. 富有较强的理论探索精神。对于文化交流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该书不仅有所涉及,而且大胆地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尽管个别观点还有可商榷的地方,但这种勇敢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各民族文化的高低优劣问题,很难界定和评判,而这个问题讲不明白,所谓文化交流就不大好叙述。书中提出了一个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传播的观点,认为一般情况下总是高势能的文化向低势能的文化传播,低势能的文化只有在融合高势能的文化后才可以生存和发展。这种观点虽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解决了研究文化交流史的一些难点,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再如关于文化的传播机制和接收机制,书中从理论解析和实际史实论述的结合上进行了重点评说。提出良好的传播机制与优良的接收机制的完美结合,才会出现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二者缺一不可。还有,文化交流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也是文化交流史研究中非常难以把握的问题。往往强调了民族性,就可能关闭开放的大门,拒绝文化的交流;提倡了时代性,又难免会引发不顾民族尊严,崇洋媚外,将文化的交流引入了歧途。该书在总结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全民

族的文化素质，国人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文化交流的方向和面貌。一个高素质的民族就会较好地处理保持民族传统和跟上时代潮流的关系，去创造高水平的新文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来讲，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应统一到现代化上来。这些理论探索，无疑增加了全书的亮点。

总之，李喜所同志主编的五卷本《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吸取了近二十年来我国文化研究热潮中的成果，阐明了许多有关文化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开拓，是一部品位很高、价值很大的力作。故我乐于为序，向读者推荐。

戴逸

全书导言

一、缘起

本书的创意，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和客观社会的需求。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中，中外文化交流占有相当的比重。在二十四史等重要的文化典籍中，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件和人物。但是，真正对漫长而又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研究，则是很晚的事了。明末清初，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有关记述外国文化输入的专著零星出现。可是，很少有人触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魏源、徐继畲等有远见的学者，才关注中外史地的考察和研究。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一批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开始很有限地触及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六十多年间，外来文化深入到中国的各个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中国有史以来从未遇到的困惑和变异，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介绍欧美和日本社会、思想、学术、制度、风俗、文化等内容的译著涌现出来，中国人的海外游记以及各种文学作品纷纷出版，许多报纸杂志也刊出了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同时有近五十位西方和日本从事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到中国的西部探险和考察。如英国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曾三次往帕米尔、新疆和甘肃考察，盗走了大批敦煌文书，由此引发了全世界众多学者投入到了

敦煌学的研究，在客观上直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研究。瑞典的斯文海定（Sven Hedin）、俄国的蒲里兹瓦爾斯基（Prejevalski）、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的橘瑞超等世界著名学者也先后来到中亚和中国西部探险，并写出了一批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著，例如《中亚和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学地形学探险考察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istan）、《中国与罗马东部》（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以及日文的《西域考古图谱》、《张骞西征考》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东西文化大论战的展开和关于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讨论以及对未来中国文化走向的探讨，中国与世界文化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这种客观态势，导引着学界去回观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催生着一门新兴专门学科的诞生。于是，在二三十年代，几位有远见的教授，如张星烺、向达等，投身于中外交往历史的研究，从而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序幕。但那时叫中西交通史。

所谓的中西交通，并不是仅为交通路线、交通方式的研究，而是包括了中西交往中的经济贸易往来、外交关系、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宗教宣传、军事干预等，是广义上的中西交流。这里的“西”，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西方，而是泛指中亚、西亚、南亚、欧洲以及北部非洲等广大地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讲，自汉代以来，在中国的西方逐步出现了四个影响较大的文明区，即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阿姆河流域以及习惯上简称为两河流域的伊斯兰文明；由爱琴海与地中海逐步扩展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早期的中西交通史，实际上着眼于研究中国与这些地区文明的关系，是内容极其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在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从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图书，为中外文化交

流史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根基。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1930年出版的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中西交通史》、1934年出版的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1937年和1945年出版的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和《西力东渐史》、1949年出版的朱杰勤的《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1953年出版的方豪的《中西交通史》、1957年出版的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这些论著大都史料翔实，论述得当，颇有个人的独到见解。但今天看来，由于当时史料的短缺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已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单就中西交通这一概念，就有修订的必要。因为交通一词，目前学界已公认为是通道、工具、交通方式等，其和文化或文明的交流有较大的区别。一般来讲，将交通纳入文化交流当中，尚好讲通；将文化交流挤进中西交通，则颇有欠缺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提倡使用近几十年来大家实际上已经接受的文化交流一词比较好。

5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发展遇到了严重的挫折。50年代末和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学术研究走上了绝路。关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变成了“禁区”，除了出版过几本叙述中国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及个别邻邦友谊历史的小书，就难以找到中外文化关系的论著了。不过，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道理很简单，要开放，要走向世界，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扩大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要在交往中保持理智和科学性，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因此，近二十年来，涌现了一批相当有水平的中外文化交流论著。例如：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维华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沈福伟的《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季羨林的《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和《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陈高华的《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 1991 年版)、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等等。最近, 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 10 本一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按中国与南亚、北美、欧洲等世界所有的大的地区为专题, 较为详细地评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演进; 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几本以哲学、文学等为专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当然, 这里的介绍恐怕是挂一漏万, 但可以明显地看出, 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可喜局面。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就会有相当的难度。然而, 高难度才具有挑战性。在仔细考察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后, 可以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这就是, 上述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基本立足于以地区、国别或某项专题的研究, 缺少综合起来按历史变迁的顺序、分阶段、比较深入和全面地去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以便让读者从宏观上把握整体变迁的规律, 从微观上具体了解某个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种做法, 虽然颇具难度, 但有不少优点。特别是在众多的按专题、以地区、国别划分的论著已经问世的情况下, 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索一下就十分必要了。本书即是出于这种思路, 尝试着按历史时期去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呼唤一部较完整和系统的新的专著, 此外, 客观的社会变革也赋予我们这个选题以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一般情况下, 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角度的确定, 既要适应学术界的发展趋向, 切中可出新意的再生点, 更应该把握时代的脉搏, 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 对文化交流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迫切, 同时中国也需要让世界真实地了解自己, 世界各国更希望从历史悠久又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实事求是地讲,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创造了灿烂而富有特色的文化, 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

化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文化的民族性奠定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民族文化不可能封闭而孤立地去发展，必须在开放与交流中才会日新月异。文化是流动的，在动态中才能生存，在传承和创新中才能显示其价值。所以文化的天性就是流动，不流动，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历史的经验表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才可以取长补短，才能使各民族的文化得到更新和发展。更深一层来讲，文化的变迁，有特定的规范，每个民族只能部分地接触到其中的奥妙，不可能是全部，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创造，才可能不断接近文化的真谛，才可以保持每个时代文化的先进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世界的某一地区或某个民族的文化具有时代先进文化的特征，但在另一个时期，则会有新的转换。这就要求暂时落后于先进地区文化的民族或国家去向先进地区学习，否则，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文化的交流是必然的。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一体性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涌现出来的，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受到了这一范式的制约，不可能逃脱。所以，文化交流是民族文化自身发展和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前提。总结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拥抱中国的规律及特点，就具有了时代意义。

二、题解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叙述的是从中国古代至1999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可以讲是20世纪以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所谓“五千年”，并不是数学运算中的准确的数字概念，仅是对中国悠久历史的一个大体的把握。一般讲中国的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加上公元纪年的两千年，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认作始祖的黄帝及其后代尧、舜、禹等，虽然带有传

说性质，但反映出了中华父系社会的基本风貌，至少也有上千年乃至更长的历史，即使不再向前追述母系社会的历史，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也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习惯上人们似乎也约定俗成地用“五千年”去概括中国的历史长河。本书沿用这一说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所谓“中外”，当然是指中国和外国了。但“中”和“外”的历史界定，则是颇难处理的一件事。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世界各国的疆域都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变化，甚至有的国家灭亡了，有的国家新生了。中国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疆域出现过许多变化。如果在叙述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按中国和世界各国疆域的变迁去随之变化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范围，则很难把握，甚至会表述不清。所以，这里的“中”，基本上以目前的中国疆域为基础；这里的“外”，也原则上以现在的世界各国作依据；个别特殊的情况灵活加以处理。历史又是一个巨大的时空概念，必须以时间或曰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纪年为依托。中外的文化交流，按常理应该照顾到世界各国的纪年，但同样会出现混乱，无法收拾。因而，本书一律以中国纪年为本位，对应地参照外国的历史时期变化。划定中国的历史时期时，则沿用为人们所接受并使用极为方便的王朝纪年与公元纪年相结合的办法，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就用公元纪年了；各卷和章节的编排，也以中国明显的历史阶段变化来分割，不过特别突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尤其将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中外文化交往放在了显著位置。

所谓“文化”，准确地加以表述相当困难。至今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至二百余个，仍然没有产生出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的定义。我们的理解，文化是人类在实践生活中的创造和升华，即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明，当然包括人类在创造文明过程中自身的不断完善和生存能力的提高，即人类自己的“人文”进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改造了人，二者的总和，则是我们所理解的文

化。显然，这是一个极广泛的大文化概念，几乎包揽了人类历史的全部。梁启超等近代的著名学者都有过这样的观点。如果认真思索起来，这样的界定不无道理，但实际操作困难较多，几乎难以具体落到实处。于是，有不少善于动脑的学者就较形象地将文化切割为三个界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位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法律制度性质的文化。这比较容易理解，又便于操作。但是，文化有时是不能切割的。比如一个精美的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它是物质的，但谁也无法否认其精神内涵，同时也渗透了管理和制度层面的文化因子。人为地去将文化割裂为几大块，也是有缺陷的。不过，任何概念的界定和运用只能是相对的。在文化的学术研究当中，将文化分成精神、物质和制度的三大块去论证和表述较为容易。因而，本书涉及的文化，基本包括这三个方面，即中外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外物质文化方面的贸易往来和中外制度方面的相互传播，相互学习。不过，不是三者平分秋色，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偶尔也有三者合而为一的情形。

西方的文化一词，英文为“culture”，德文是“kultur”，皆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其原意是留心、留意、练习、居住、耕种等，实际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可见，文化即意味着人的创造，即人的本能的展现。但中国古典的文化内涵，与此有一定的差异。最原始的意思是“以文教化”。《易经·象传》中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要以“人文”为规范，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将人纳入一定的规范。首次将“文”和“化”合在一起，使用“文化”一词的，晚到西汉才出现。刘向《说苑·指武》中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将文化与武力相对应，深刻的含义仍是作为夺取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内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特别到了近代以后，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含义也有了大的变异，并使文化成为一